

Psycho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By Meritxell Serrano Tristán
Translated by CHENG Yingrui

Received: March 21, 2024

Accepted: March 20, 2024

Published: June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Meritxell Serrano Tristán, trans. CHENG Yingrui. (2024). Psycho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2), 027–04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2>

Abstract: The mutual implication of psychoanalysis with translation has produced a significant body of works that address the issue of subjectivity in the practice and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This paper traces this implication to the early beginnings of psychoanalysis and reviews some of the most recent literature produced within translation studies.

Keywords: translation theory; psychoanalysis; translation choices

Sour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etras*, 2014 (56): 55–88.

Notes on the author: Meritxell Serrano Tristán is a professor and researcher at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 Sciences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CHENG Yingrui, a teaching assistant at Lianyung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graduated from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ith an interest in Lacan's psychoanalysis, email address: chengyru@qq.com.

精神分析與翻譯： 一項綜述

¹梅裏特塞爾·塞拉諾·特裏斯坦/文 ²程英瑞/譯

¹哥斯達黎加國立大學;²連雲港職業技術學院

摘要: 精神分析與翻譯的相互影響催生了大量針對翻譯實踐教學中涉及主體性的論著。本文將這一學術現象



追溯至精神分析的初始階段，並回顧了翻譯研究相關領域的部分前沿文獻。

關鍵詞：翻譯理論；精神分析；翻譯選擇

來源：原文載於《文字》(Letras)，2014年，總第56期，55—88頁。

作者簡介：梅裏特塞爾·塞拉諾·特裏斯坦是哥斯達黎加國立大學文學和語言科學學院的教授和研究員。

譯者簡介：程英瑞，連雲港職業技術學院助教，畢業於四川外國語大學，英語語言文學碩士，主要研究興趣為拉康精神分析，郵箱：chengyru@ qq. com。

一、引言

精神分析和翻譯之間存在關係並不是一個新現象。精神分析學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偶然間將精神分析理論與翻譯進行了比較，比較了無意識的表徵和外語的關係(Bass 102)。1982年，《Meta》雜誌出版了一本精神分析方面的特刊，1998年《TTR》雜誌也出版了精神分析特刊。這兩本期刊都圍繞翻譯和精神分析之間的相互影響展開。從那時起，許多翻譯學者和精神分析學家便致力於擴大精神分析與翻譯領域在實踐與研究層面的關聯度。其中，多數研究的論點是，從語言學和文化路徑出發的翻譯實踐和理論未能識別到無意識這個總是在文本生產中起作用的維度。無論是口誤，在譯者、作者和文本之間轉移的含義，還是譯語選擇，無意識都是文本生產的一部分。鑒於此，本文將探討這種聯繫。下文將首先簡述精神分析發展史及其與語言的近似性，並回顧翻譯學者針對精神分析與翻譯之間的關聯論所做出的貢獻。

二、歷史背景

19世紀80年代，奧地利神經學家、精神病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維也納建立了精神分析學說，該學說是一種主要基於無意識假說的理論和實踐。1923年，弗洛伊德將精神分析定義為(1)用來研究(無意識)心理狀態的方法，(2)用於治療神經症的方法，(3)一個基於通過研究無意識和治療神經症獲得的精神分析見解的科學學科(Two Encyclopaedia Articles: 236)。

「精神分析」一詞於1896年首次使用，但在一篇於1924年刊於《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文章中，弗洛伊德宣佈1900年為精神分析的誕生年，並在文中引用了最初於1899年出版的《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而該著作向世界介紹了精神分析這個新出現的研究領域(A Short Account of Psycho-Analysis: 191)。

精神分析最初被認為是一種以催眠方法為主的醫療手段，旨在治療神經性障礙(Fontana: 27)。早年的精神分析促使弗洛伊德和約瑟夫·布洛伊爾(Josef Breuer)於1893年發表了一份關於癔症的初步報告，隨後於1895年發表了《癔症研究》(Studien Uber Hysteria, 1955)。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力比多理論》(Psycho-Analysis: The Libido Theory)中總結說，他在二十五年後寫的兩篇文章裏記錄了他和布洛伊爾早期的研究成果。首先，他們發現患者的症狀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傳達了某種意義，並且這種症狀會替代正常

行為；其次，他們發現，當意義被發現時，症狀就消失了（*Two Encyclopedia Articles: Psycho-Analysis: The Libido Theory*: 235）。

然而，發現了精神分析讓弗洛伊德在早期迅速地對該學說有了更為複雜的理解，這種理解背離了西方思想的哲學和心理學傳統（Tubert: 28），他們將弗洛伊德踢出了當代精神病學的主流（Gay: 1）。

弗洛伊德的發現有何新穎性和革命性？值得一提的是，當弗洛伊德開始與布洛伊爾合作時，無意識的概念就已經在使用了。19世紀初期，叔本華（Schopenhauer）、卡魯斯（Carus）、馮·哈特曼（Von Hartmann）等哲學家就已經對無意識進行了闡釋（Landman: 53），德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 J·F·赫爾巴特（J. F. Herbart, 1776-1841）也在精神分析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發現了無意識這一心理過程的存在（Strachey: 156）。19世紀70年代，法國醫生和心理學家皮埃爾·珍妮特（Pierre Janet, 1859-1947）根據臨床數據發展了一套完整的動態精神病學理論，該理論強調「一種逃避意識並控制意識主導的動力」概念（Landman: 55）。

弗洛伊德發現的獨特之處在於。一方面，他在早期著作中就開始認為，無意識扮演著說話的角色。拉康經常強調，「從一開始，人們就未能認識到弗洛伊德以最精確和明確的方式分配給無意識能指地位的構成性作用」（*É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426）。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發現，無意識具有控制人類行為這一從未發現的作用。這意味著，自我不再具有全能作用。弗洛伊德很清楚他的發現意味著什麼。在一次精神分析入門講座的結論中，弗洛伊德本人將他對無意識的發現與哥白尼和達爾文的發現進行了比較：哥白尼揭示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宇宙系統的一小部分；達爾文「摧毀了人類在創造中所謂的特權地位，證明人類是由動物進化而來，以及其根深蒂固的動物本性」（*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Fixation to Traumas. The Unconscious*: 284）。這三項發現標誌著科學、思想和感知史上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說，無意識的發現代表了「當今心理學研究的第三次也是最顛覆性的打擊，該研究試圖證明自我甚至不能掌控自己，卻又必須聽命於自己頭腦」（*Introductory Lectures*: 285）。該學科將「人類世界的中心從意識轉移到無意識」（Felman, Jacques Lacan: 64），弗洛伊德理論的關鍵問題是「與其說是中心改變的科學後果，不如說是去中心化的科學過程，是一種新型反身模式」（*ibid.*）。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新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事實上，弗洛伊德所做的不僅僅是建立一個形而上的實體：他描述並展示了無意識是什麼、它如何運作以及它與其他心理類別有何不同。沿著這條線，他為有關無意識的堅實理論與實踐奠定了基礎。他提出了無意識存在的假設，接受人類行為中存在阻抗和壓抑等現象，提出了對性的獨特理解，並承認了俄狄浦斯情結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的主導地位。這些精神分析理論的基礎連同它的技術（即對語言、自由聯想、夢的解析、各類失誤的獨特見解）彰顯了弗洛伊德那個時代的主流精神治療和科學研究的一大突破。

弗洛伊德記述到，精神分析儘管一開始遭到科學界的漠視，但後來卻引起了科學界的「強烈反對」（*A Short Account*: 200）：

但是，在強調精神世界中的無意識的過程中，我們招來了對精神分析最惡毒的批評……我們精神分析學家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呼籲內省人；但我們似乎命中註定要去做最有力的表達，並用涉及到每個人的實證材料來進行論證。因此，大家普遍抵制精神分析，漠視我們為此付出的所有心血，反對

這一科學理論的每一條規則(Introductory Lectures: 284)。

這些反對並沒有阻止精神分析發展成為一場國際運動,「1902年開始,大量年輕醫生聚集在我(弗洛伊德)周圍,明確表示要學習、實踐和傳播精神分析的知識」(*On the History*: 25),其中就有奧托·蘭克(Otto Rank)。

1909年,弗洛伊德和卡爾·榮格(Carl Jung)受邀在馬薩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學進行一系列講座。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有機會在公開場合談論精神分析(*On the History*: 36)。除了榮格和弗洛伊德之外,這些講座還有三位其他精神分析的代表:桑多爾·費倫齊(Sándor Ferenczi)、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和布裏爾(A. A. Brill),後者已經是紐約的執業精神分析師(*ibid.*)。弗洛伊德還結識了哈佛大學神經病理學教授普特南(James J. Putnam)。普特南最先發表了「對精神分析不贊同的觀點」,然後來堅定地支持並向科學界推薦精神分析(*ibid.*)。1911年,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發現證據表明,作為臨床手段的精神分析不僅在奧地利和瑞士得以實踐,而且在美國、英國、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也得到了實踐關照(*A Short Account*: 201)。此外,蘇黎世精神病學學院在方方面面也助力了精神分析在歐洲之外的傳播(*On the History*: 27)。

1920年,由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主編,專門面向英國讀者的《國際精神分析雜誌》(*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出版。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及屬下的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英國公司以國際精神分析圖書館(*Internationale Psychoanalytische Bibliothek*)的名義推出了一系列精神分析作品。(*Freud, A Short Account*: 201)

隨著地域影響力的擴大和體系上的擴張,精神分析迎來了一個更廣闊的領域:「精神分析從神經症和精神病學領域擴展到其他知識領域」(*On the History*: 40)。在《笑話及其與無意識的關係》(*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1905)中,弗洛伊德將分析思維模式應用於美學問題(*On the History*: 42);在《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 1914)中,他提出:

嘗試用分析的方法來處理社會人類學問題;這一研究路線直接引向我們文明最重要構成的起源問題,即國家結構,道德和宗教,以及禁止亂倫和良知(*ibid.*)。

醫生愛德華·希奇曼(Eduard Hitschmann, 1871-1957)和哲學家阿爾弗雷德·羅伯特·馮·溫特斯坦(Alfred Robert von Wintersteinm, 1885-1959)是第一批將精神分析應用於哲學體系和人格問題的人,儘管對弗洛伊德來說,他們最初的結論需要「擴展和……更深入的調查」(*ibid.*)。

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經常表明要「回到弗洛伊德」,繼續將精神分析從純粹的治療方法中抽離出來,使之作為一個「關於不同文化和社會現實的新形式的知識」(Pombo: 69)。拉康要回到弗洛伊德的原始文本是試圖將精神分析從「教條式和過於簡單化的解釋……以及不準確的翻譯」中解放出來(*Felman, Jacques Lacan*: 54),並重振無意識的理論和實踐發展。拉康的著作不僅對這一思想流派起源進行了歷史性回歸。重要的是,他努力揭示了「弗洛伊德文本中起作用且具更深層次的邏輯。這種邏輯賦予這些文本一致性,儘管表面上模稜兩可」(*Evans*: 68)。

拉康對弗洛伊德的引用也標誌著一種「語言學轉向」。這一轉向最初受到了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 (Claude Lévi-Strauss) 對人類學研究的啟發 (Evans: 68)。拉康借用語言學中的符號、能指、所指等語言學概念以及語言與言語的區別 (ibid. 102), 揭示了「人類主體性的語言學基礎」(ibid. 154)。

然而, 拉康對人文學科傳統對象的興趣並不止於此: 他也會刻意地涉足文學領域。比如, 他在演講中使用了大量的雙關語和新詞, 一直都在發表一些哲學思考, 還會發表針對瑪格麗特·杜拉斯 (Marguerite Duras)、埃德加·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 和詹姆斯·喬伊斯 (James Joyce) 等作家的論文。對文學的興趣為拉康贏得了「語言工作者」的標籤。實踐精神分析學家和理論家丹尼斯·波特 (Dennis Porter) 在閱讀拉康的著作時發現這個標籤是合情合理的: 「幾乎所有拉康的著作和教義都以某種方式對語言進行調解, 無論是對語言作為無意識和人類主體的組成部分, 還是作為對他人言語的分析本身中」(1067),

然而, 這種趨勢已經出現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 其中: 三頁中就有一頁是語言學參考資料, 兩頁中就有一頁是邏輯推論, 而對經驗的辯證理解則到處都是。越是直擊無意識, 語言分析就變得更加普遍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150)。

事實上, 拉康經常聲稱對弗洛伊德的回歸無非是重複弗洛伊德著作中已經存在的內容: 「我剛才所說的內容幾乎沒有什麼獨創性……其中每個隱喻都曾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以同一主題頻繁重複」(cf. Felman, *Jacques Lacan*: 54)。

此外, 拉康在其職業生涯中越來越關注語言。這也是為什麼, 路易斯·阿爾都塞將拉康對弗洛伊德的回歸定義為「一堂典型的閱讀課, 其效果……遠遠超出了其最初的目標」(cf. Felman, *Jacques Lacan*: 19)。費爾曼發表了大量涉及精神分析與文學關聯的文章, 對他來說, 拉康的精神分析對闡釋的本質給出了全新理解, 對「在徹底改變闡釋者可用程式、策略和技術的閱讀可能性」做出了調整 (ibid. 19)。

這種徹底的改變導致了諸多方面與弗洛伊德的發現背道而馳的精神分析應用形式。費爾曼本身就是一位文學批評家和精神分析學家, 她對精神分析批評家進行了一項具有啟發性的研究, 他分析了埃德加·愛倫·坡的詩歌和小說, 並對那些「認為藝術作品即是對創作者精神世界真實回饋這樣的簡單劃歸」進行了譴責。費爾曼發現文學評論家將愛倫·坡的文學視為一種手段, 來追溯「(他的) 藝術作品到他的神經異常狀況」(Krutch cf. Felman *Jacques Lacan*: 34)。瑪麗·波拿巴 (Marie Bonaparte) 頗具影響力的研究, 1933 年出版《埃德加·坡: 精神分析研究》(*Edgar Poe: Étude psychanalytique*) 且附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序言的研究便是一個案例。在費爾曼看來, 這項研究「主要是為了診斷(愛倫·坡的) 疾病並從其詩歌中找到疾病的痕跡」(ibid. 36)。通過將詩歌簡化為臨床現實, 應用精神分析未能認識到精神分析話語提出的挑戰。

波拿巴的應用精神分析傳統一直延續到我們這個時代。在《脫離我的體系: 精神分析、意識形態和批評方法》(*Out of My System: Psychoanalysis, Ideology and Critical Method*) 一書中, 弗雷德里克·克魯斯 (Frederick Crews) 提出, 「通過做精神分析假設, 批評家可以展現一個作家的公共意圖如何被其個人的喜好公然扭曲……或者再次, 他可以根據作者無心展示的某些反復出現的主題對作者進行傳記般的推論」(168)。

彼得·布魯克斯 (Peter Brooks) 的文章《弗洛伊德的主線: 敘事問題》(*Freud's Masterplot: Questions of*



Narrative, 1980) 打破了精神分析的理論傳統, 利用文學視角閱讀精神分析領域的經典文獻。布魯克斯反對「精神分析作為一種穩定的主話語, 將文本視為一種特定心理的無仲介記錄」這一觀念, 聲稱「可以對文本本身進行精神分析批評, 但這種批評通常不會成為文本心理發生, 即作者無意識、文學反應機制, 即讀者無意識, 或文本人物神秘動機, 即角色無意識(若存在)的研究」(Brooks: 299)。

這一路徑得到了如肖珊娜·費爾曼(Shoshana Felman, 1982, 1983, 1985, 1987, 1992, 1993 等) 和傑弗裏·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 1985) 等著名學者的認同, 他們的作品探討了精神分析和文學之間的含義與複雜性。

在收錄了上述布魯克斯文章的論文集《精神分析與文學》(*Psychoanalysis and Literature*) 的序言中, 費爾曼認為「對於精神分析來說, 文學不僅是連續的外部經驗領域, 可以在其中檢驗假設並確認發現, 也是其概念框架和理論主體的構成要素。」(9) 這些批評家並沒有將精神分析作為一種凌駕於文學的權威知識體系來解釋和解釋文學, 而是提出了一種知識和語言兩個體系之間真正的對話概念。解釋者不再被要求「將習得的科學、先入為主的知識應用於文學文本」, 而是「探索……闡明這兩個領域相互暗喻的各種方式」(ibid.)。

三、翻譯與精神分析

與此同時, 翻譯研究中開始出現精神分析理論。正如安德魯·本雅明(Andrew Benjamin) 在他的文章《翻譯的起源: 精神分析與哲學》(*Translating Origins: Psychoanalysis and Philosophy*) 中指出的那樣, 「這裏涉及的不僅僅是簡單的聯繫或相互關係, 翻譯從一開始就存在於精神分析中。」(18) 事實上, 兩者之間的隱喻聯繫最初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本人建立, 他經常將精神分析比作為翻譯, 將無意識比作為一門外語(Bass: 102-103)。

1982 年和 1998 年分別由 *Meta* 和 *TTR* 出版的兩期特刊標誌著精神分析進入了翻譯研究的視域。這兩本期刊都致力於闡釋翻譯和精神分析之間的相互影響。

然而, 從歷史上看, 精神分析師和翻譯學者都參與了兩大研究領域的對話。這種對話有不同的形式, 略可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學者是將翻譯作為一種工具或者隱喻來理解精神現實本質及其對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的影響; 第二類學者將精神分析研究成果分析翻譯理論和實踐, 試圖提高我們對翻譯的理解並解釋翻譯過程中涉及的主體性問題; 第三類是將精神分析文本的翻譯作為研究主體^[1]。本文將討論前兩類, 即翻譯作為理解精神現實的本質以及精神分析研究成果在翻譯理論和實踐層面上的應用或隱喻。

(一) 精神分析理論中的翻譯

那些將翻譯作為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工具進行反思的學者主要有帕特裏克·馬霍尼(Patrick Mahony, 1982)、安德魯·本雅明(Andrew Benjamin, 1989, 1992)、讓·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 1992) 和埃斯特·普林(Esther Peeren, 2004) 等人。

《對精神分析翻譯的理解》(*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in Psychoanalysis*) 最初由《美國精

[1] 有關此類研究, 請參閱 Arich-Gerz 2006、Hall 2005、Mahony 2001、Gray 1992、Bass 1985。

神分析協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發表,後來收錄在*Meta*的特刊中,帕特裏克·馬霍尼(Patrick Mahony)在文中論證了「弗洛伊德位列翻譯界最偉大的思想家和創造家的歷史性成就」,並對弗洛伊德文本語料庫中的翻譯概念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在他看來,該調查「展示了弗洛伊德語料庫所覆蓋的翻譯概念範圍並展示了弗洛伊德語料庫中翻譯概念的價值所在,即賦予看似不同的現象以驚人的連貫性」(64)。馬霍尼認為,對於弗洛伊德來說,神經症、症候、分析師的闡釋和精神物質的運作機制均是翻譯的形式,而壓抑則被理論化為翻譯的一種失敗(*ibid.*)。

在《翻譯與哲學的本質》(*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1989)一書中的「精神分析與翻譯」一章中,安德魯·本雅明(Andrew Benjamin)採用了類似的方法,講述了「翻譯」一詞在弗洛伊德著作中的使用,參考文獻之間的關係以及精神分析中的意義結構。本雅明重點關注翻譯這個術語的兩種特殊用法:首先與分析者的行為有關——分析師作為翻譯者;其次,他認為翻譯是精神生活的一個要素(136)。

本雅明指出,弗洛伊德的文本中,翻譯作為精神生活的一個要素在兩個層面上運作:第一,「顯性內容是潛在內容的翻譯」;第二,「顯性內容也是意識語言的譯本」(145)。這兩大層次的翻譯讓本雅明繼續發問:如果顯性內容已經是翻譯後的結果,那麼原來的內容(對於精神分析而言)是什麼?或者更準確地說,原文是由什麼構成的?此外,如果最新的文本已經是翻譯過了的,那麼又去翻譯什麼呢?

必須指出的是,儘管本雅明為譯者討論了原創性和對等性的概念,但他的目標並不是糾纏這些問題,而是去反思精神分析理論的本質。他討論的關鍵是精神分析中的意義結構,以及與弗洛伊德的發現相一致的敘事,這種敘事「不再依賴於對古老意義或意義起源的恢復或參照」(Benjamin: 6)。本雅明還指出,「目前這些關注點的核心是將分析者描述為譯者,對翻譯活動的描述從幻想的語言變成一種通用語言」(*ibid.* 144)。這些隱喻總是對原文和翻譯地位提出質疑——這種地位常常被當今的語言研究輕視。

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將翻譯看作與當前古典精神分析趨勢背道而馳的一種分析種類。1990年,拉普朗什在肯特大學發表題為「精神分析、時間與翻譯」的演講,他拒絕將分析方法中的「闡釋」視為是對現在到過去的一種翻譯。拉普朗什基於弗洛伊德「拒絕屈服於‘心理綜合’的誘惑」(171)這一論斷建構出一種自己的「分析師重塑患者綜合視野」的分析方法,而這一方法可以視作「翻譯的過程」,即一種「譯的翻轉」。值得注意的是,拉普朗什的翻譯概念不涉及不同的語言體系。對他來說,「分析性闡釋在於消除現有的、自發的、也許是症候性的翻譯,以便在翻譯之前重新發現其最想翻譯的內容,以及可能會出現一個‘更好’的翻譯;也就是說,一個更完整、更全面、更少壓抑的翻譯」。(170)

埃斯特·普林(Esther Peeren, 2004)討論了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和讓·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的著作,認為兩位作者都主張「主體的建構在於主體間的翻譯」(1)。在巴赫金看來,翻譯是人文學科的一個理論範疇,因為其涉及「建立、傳播和解釋他人的話語」(cf. Peeren: 357)。在拉普朗什那裏,翻譯處於精神分析的理論範疇。巴赫金口中的主體被認為是一種內外混雜的「半翻譯」(5),而對於拉普朗什來說,要麼完全翻譯,要麼就完全不翻譯:「拉普朗什的無意識因此採取了……幹擾的形式,在自我和自我意識之間進行幹涉(7)。埃斯特(Esther Peeren)總結說,兩位理論家都將主體轉變為譯者,並將翻譯概念化為轉換邏輯(11)。

(二) 翻譯研究中的精神分析

一部分翻譯學者已經運用精神分析概念來解釋翻譯理論和實踐,並用以解讀無意識在構成目標文本過

程中的影響。學者們研究的範圍從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來闡釋翻譯的一大面相或問題,比如道格拉斯·羅賓遜(Douglas Robinson)的《誰在翻譯?》(*Who Translates?*)就是此方面的典型;到精神分析研究成果對翻譯過程以及翻譯文本無意識的影響,比如艾倫·巴斯(Alan Bass)、丹尼斯·波特(Dennis Porter)、羅斯瑪麗·阿羅約(Rosemary Arrojo)、瑪麗亞·保拉·弗洛塔(Maria Paula Frota)、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瑪爾塔·馬林-多明(Marta Maríni Dòmine)、安·昆尼(Anne Quinney)和埃琳娜·巴塞爾(Elena Basile)等人在此方面提出了各自見解。這些學者的研究展示了精神分析理論從諸多方面幫我們理解和閱讀真實的翻譯文本,豐富與發展翻譯理論的內涵與外延。

在《翻譯與對異的審判》(*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一書中,貝爾曼(Antoine Berman)對翻譯進行了分析——對「每個翻譯中都存在的文本變形」進行了仔細檢查,防止翻譯成為「對異的審判」(286)。貝爾曼認為,文本的變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無意識的,並且構成了譯者存在的一部分:也就是說,譯者無法避免這些失誤。因此,他們的翻譯「必須接受分析,才能讓無意識處於中立狀態」(同上)。貝爾曼定義了文本變形的十二種傾向,並為其中大多數提供了例子。這些傾向性下的翻譯文本「比原文更‘清晰’、更‘流暢’、更‘純粹」,貝爾曼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傾向性「為了表達意義而破壞了字母」(297)。然而,貝爾曼認為翻譯不應該局限於簡單的意義回溯,而應該專注於字母,即進行字母層面的直譯從而承擔語言的構成性作用。關注字母翻譯「恢復了文本特定的意指過程(不僅是意義呈現的層面),並轉變了翻譯語言」(ibid.)。

道格拉斯·羅賓遜(Douglas Robinson)的《翻譯與禁忌》(*Translation and Taboo*, 1996)借鑒了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Totem and Taboo*)。該書從古代神秘宗教、遠至基督教時代以及現代的文本證據中汲取靈感,找出一個「反翻譯」的籠統禁忌。羅賓遜還介紹了拉康的無意識概念,即「他者的話語」,他將其改編到其論著中,將其視作「神秘的他者」和「理性的他者」來討論,從而解釋為什麼翻譯宗教文本是中世紀教會的禁忌,後來遭到全面禁止:「神秘的他者或曾經在‘前理性’文明中是用來禁忌意識的」(31),並在其內部「通過壓抑或否定,創造了反叛精神或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意識,也就是理性的他者」(ibid.)。理性的他者「培養了對絕對可交流的信念」,而「神秘的他者更傾向於感覺文本,主張一種直覺上、前語言狀態的經驗……理性的他者更傾向於對文本進行感知,感知則是可用可靠的對等物進行翻譯的準繩」(37)。

在《誰在翻譯?》(*Who Translates?*)中,羅賓遜利用了拉康的其他概念,例如簡化的L圖式及其四個術語(主體、小他者、自我和大他者),以探究譯者主體性。他提出了「他者性」問題,目的在於闡釋譯者進行翻譯工作時提出的各樣觀點。他也著手探索「譯者與他者間的灰色地帶:作為完全控制自己所有思想和行為的理性的、具有完全意識主體的譯者……與作為充滿其他觀點的空洞個體和一個作為他人言論發聲的管道或者媒介的譯者的相互關係」(11)。在第五章「混亂的自我」中,羅賓遜介紹了拉康的「他者類型學」。對羅賓遜來說,以下他者構成了受所有他者力量制約的自我形象:1)看不見的譯者—主體;2)翻譯過程中融入的人和工具;3)譯者的自我理想;4)譯者的大他者。羅賓遜對主體性的看法不同於西方思想中長存的理性主義傳統,即「存在一個位於大腦某處的,名為心智、智力或理性的決策者」假設(151)。出於「混亂的自我」這一假設,羅賓遜不接受傳統觀念意義上的腦力活動,他認為決策受諸多因素或力量制約,其中就包括拉康的他者概念(ibid.)。儘管羅賓遜對翻譯主體性概念做出了突出的理論貢獻,但其研究並未提供充足案例來證明這些觀點和實際影響。

在《精神分析與譯者的任務》(*Psychoanalysis and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書中,丹尼斯·波特(Dennis Porter)總結了拉康精神分析對翻譯工作和翻譯理論的啟示。確立了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保羅·德曼(Paul de Man)提出的翻譯概念以後,波特認為拉康的大他者概念和象徵秩序概念總結了「人類個體與他們所說與所寫語言間的脫節」(1077)。這種主體(或分裂主體)的構成性脫節同時意味著「一種徹底溝通的不可能性」與「人們對語言的信仰」(ibid. 1081)。一旦涉及兩種語言間交流,「雖說到處可能是誤譯,但這比德曼‘翻譯不可能’這樣的陳述要溫和許多(ibid.)」。波特認為翻譯失誤或「失效」只是受了無意識的影響——只有在傾聽或密切關注「失敗的成就」時,「我們才能瞭解彼此和自己」(1080)。

因此,這樣的翻譯錯誤或誤譯就被解讀為滿足無意識欲望的結果。用波特的話說,雖然翻譯是可能的,但翻譯也是語言之間的一種溝通失誤,因為「我們仍然陷入那個最初構成主體,並永遠超出我們試圖掌控範圍的能指網路中」(1081)。儘管本文存在理論相關性,但波特沒有提供翻譯實例來闡釋他的論點,從而限制了他的研究範圍。

阿瑪莉亞·羅德裏格斯(Amalia Rodríguez)在《翻譯家的知識:走向翻譯倫理》(*El saber del traductor: hacia una ética de interpretación*, 1999)中探討了譯者責任的問題,這與翻譯界尚未細緻討論的倫理問題有關。羅德裏格斯在她的書中總結道,翻譯過程涉及的不僅是譯者的理性、意識和自我意識。因此,她提出了一種與精神分析上的欲望和無意識有關的翻譯倫理。這種倫理希望譯者能夠「說明他或她的動機、所用工具與自我訴求。我們也希望讀者能夠非常精確地描述能夠在文本中讀到什麼」(25)。

作為無意識主體,譯者必須將自己置於符號秩序中,「認識到語言已經承載了我們整個歷史」(ibid.)。這段歷史是譯者的所知資訊:我們所寫或所說的資訊並非源於原本這一穩定來源,而是來自譯者母語能指以及我們所譯的原語能指的組合。此外,羅德裏格斯認為,「如果任意言論都包含一個價值觀,譯者就必須以此為基礎。也就是說,譯者需要以本人的價值觀為基礎,關注文本話語的對話性質、對他人敞開的內容、自然生成的含義,或者將自身置於作者之位,傳達作者意圖之外的表述矛盾」(266)。此外,由於作為普遍話語的無意識存在,無論翻譯能否達意,譯者必須對自己的所有決定負責。

與羅德裏格斯的做法類似,羅斯瑪麗·阿羅約(Rosemary Arrojo)試圖在課堂上教授譯者所需的知識。在阿羅約看來,未來的譯者需要學習的是全面的「真理政治」,它「決定了譯文生成、傳播及對原文—譯文進行評價的機制」(145)。這些「真理政治」也在選擇譯者這一事件中起作用:它成了決定將專案委託給一位譯者或翻譯機構而不是另一位譯者或翻譯機構。出於譯文產出、傳播與評估的複雜過程,譯者必須學會如何寫作。這意味著,譯者首先要學會在翻譯過程中對其翻譯決定負責,並明晰這一責任何以限制自己的翻譯工作。換言之,譯者須明白,其翻譯選擇永遠不會自由,「因為翻譯選擇總是在權力關係和各種關聯中產生,譯者的角色就是積極的變革者和變革的代理人」(Arrojo: 146)。

作為代理人,譯者必須學會寫作,即成為待譯文本的「作者」。因此,譯者「必須明確並理解將他們與文本及其原作者聯繫起來的移情關係」,以及在課堂上與翻譯教授的關係(Arrojo: 145)。與羅德裏格斯一樣,阿羅約認為,譯者若接受他們是文本含義的決定者,並為各自翻譯策略負責,他們便接受了「翻譯自由的不可能性」(146)。

瑪麗亞·保拉·弗洛塔(Maria Paula Frota)的研究進一步深入,展示了目標文本中無意識影響的實存。其著作《翻譯寫作的獨異性》(*A singleidade na escrita tradutora*, 2000)開啟了翻譯研究、語言學和精神分析

之間的理論對話,探討了各自處理語言的不同路徑。在對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研究進行深入討論並回顧了翻譯與精神分析交互的跨學科研究之後,弗洛塔探討了譯者寫作的獨異性。在其研究中,她深化了弗洛伊德對言語錯誤和言語失誤的理解,將翻譯的獨異性列入其中。

弗洛塔在《銘刻在翻譯文本中的無意識》(*The Unconscious Inscribed in the Translated Text*)中指出,儘管翻譯研究者做了很多工作來對抗「譯者的隱身」,但大多數當代理論的關注焦點「都集中在主體的主觀主義上」(2)。在弗羅塔看來,這一概念宣揚了這樣一種信念,即「作者是一個自由或自主的個體,其自身的理性是其作品的唯一來源」(ibid.),而精神分析自誕生以來就堅稱:「自我甚至不是自己大腦的主人,他必須聽命於那個自己知之甚少的,並在大腦無意識層面生產的資訊」(Freud, *Introductory Lectures*: 285)。這個觀點與阿羅約的「翻譯即書寫」以及這種做法所帶來的局限性相同。

弗洛塔想要探討「翻譯行為中隱匿的無意識領域」(*The Unconscious*: 2)。為此,她重點關注誤讀和筆誤,而這些誤讀和筆誤又被解釋為刻在譯本中的無意識浮現。根據弗洛伊德的假設,這些言語錯誤攜帶著「語言使用者所不知的資訊」(ibid. 6)。儘管這些言語失誤「無可否認是一個錯誤」,因為它們帶來了與既定或可預測事物的徹底決裂,但「主觀的言語選擇……不會……這麼徹底地破壞語碼,產生不完整的廢話」(ibid. 9)。這些主觀選擇或弗洛塔所說的「獨異性」是逃避二分法的手段:

既不正確也並非錯誤,這也不是說,正確與錯誤共存。受無意識侵入的二次闡述影響……這些形式確實以無意識的形成組成,但不太明確、更微妙,也許是由於無意識在與壓抑力量的鬥爭中只取得了部分成功(ibid. 9)。

弗洛塔隨後分析了一名學生對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的詩《仁慈》(*Kindness*)的翻譯。在上下文中,學生譯者選擇將介詞動詞「picking up(撿起)」翻譯為「colando(粘合)」:

Sugar is a necessary fluid,
Its crystals a little poultice.
O kindness, kindness
Sweetly picking up pieces! (ibid. 10)

糖是人體必需的液體,
其晶體有點膏劑。
噢,仁慈啊,仁慈啊
甜蜜地撿起碎片!(ibid. 10)

弗洛塔要求學生證明其翻譯選擇的合理性時,學生提到了其童年的一個場景,她的母親烘烤蛋糕時會對她說,「蛋糕的膠水是糖霜」。事實上,蛋糕因麵團太軟而崩碎時,「只要有一點耐心,加上糖霜,我們就能把蛋糕粘回去」(ibid. 10)。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學生的選擇並非「拿起」的字面翻譯,而證明了她無意



識選擇的合理性,譯者開發了一個能指網路,這讓她的翻譯選擇在這首詩歌的結構中佔有一席之地。弗洛塔沒有解釋如何區分譯者的選擇是出自本人意識層面的錯誤還是其無意識動機引起的失誤。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注意,精神分析的前提是無意識總是參與語言現象,因為無意識就是語言。鑒於此,感知層面上的錯誤永遠不會缺乏(潛在的)意義。

在文章《翻譯失誤:一個教學課題》(*Errose lapsos de tradução: un tema para o ensino*)中,弗洛塔研究了不同類型的翻譯,首先就是安東尼·皮姆對二元錯誤和非二元錯誤的區分。在將非二元錯誤視為主觀層面上可能的變化,或是可被接受的翻譯決策之後,弗洛塔認為二元錯誤毫無疑問是錯誤的翻譯選擇,相當於口誤。繼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1901)所記錄的發現之後,弗洛塔將這些言語失誤理解為持續與意識鬥爭的無意識思想或欲望的結果。在她看來,這些錯誤不僅出於譯者的疏忽,而且也出於無意識資訊與意識的持續對抗(154)。

二元錯誤既可能在解讀原文的過程中產生,也可能在書寫目標語言的過程中產生。例如,在閱讀過程中,譯者可能由於「語言橋」而讀錯單詞(*Erros e lapsos*: 152)。「語言橋」是弗洛伊德發明,用以表示能指間的物理相似性導致的筆誤。或者,譯者可能完全理解了原文,但同樣也出於「語言橋」的原因,在書寫目標文本過程中出現了筆誤。為說明這種類型的錯誤,弗羅塔舉了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詩中的一個反義詞案例,「在你身上我包裹了一千年」,這首詩被翻譯為「Em Voices Contenho Mil Tears Progressivas」(意思是「在你身上我包裹著一千個漸進的眼淚」)(cf. Frota *Erros e lapsos*: 152)。「歲月(times)」和「眼淚(tears)」之間的視覺相似性充當了「語言橋」,產生了口誤或二元錯誤,突出了無意識在翻譯選擇中的作用。弗羅塔並沒有用譯者的無意識動機來解釋這些錯誤,因為她知道這種理解只能通過個體分析才能實現。然而,無論讀者是否能夠揭示其動機,將此類錯誤稱為無意識動機的產物仍是有效的,因為精神分析理論普遍認為無意識靠這些方式浮現。

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他的論文《譯製異:論譯者無意識》(*The Difference that Translation Makes: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探討了無意識在翻譯中的影響。在這篇文章中,韋努蒂深入探討了無意識「可能在譯者選擇中發揮的作用」,並說明「無意識在翻譯文本中可見、重現的可能」。(215)韋努蒂建議不要以精神分析為出發點,而要研究翻譯理論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說,韋努蒂認為,翻譯所造成的譯文和原文之間的差異可以視為一種互文效果和互文關係損失、語境損失、能指物質性的損失;以及一種增益,即一條不同於原文的能指鏈、譯本創造的文體效果,以及不同的含義、結構、意象和傳統所帶來的語義擴散可能,且這些因素「遠遠超出了語義學層面的對等」(219)。根據語言學家讓-雅克·勒賽克爾(Jean-Jacques Lecercle)的研究,韋努蒂將這些文本效果稱為「語言剩餘」。這些剩餘將研究引向「語言的異質性」,從而「使單義所指的交流變得複雜」(ibid.)。韋努蒂認為,「在翻譯中,語言剩餘由語言形式和文本效果組成,它們同時改變了譯語環境當下的官方語言以及外語文本的形式和語義維度」(ibid.),而且這些語言形式和文本效果可能是有意的(如補償、顯露等)也可以是無意的(如口誤)。

韋努蒂發現了艾倫·巴斯翻譯的《寫作與差異》(*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78)存在對法語語法的曲解。法語原文為「Quand elle réinstitue un corps, elle est poésie」,其近似的英語版本會是「When it (reinstates) a body, it (translation) is poetry(當它重新建立一個框架時,它(翻譯)就是詩」,巴斯將這句法語翻譯為「And when that materiality is reinstated, translation becomes poetry(當那物質性被恢復時,翻譯就變成了詩)」

(Venuti: 220)。韋努蒂重點關注了用指示形容詞「that」代替不定冠詞「un」,其中「that」顯然指文章前三句中提到的外文文本的物質性(221)。韋努蒂嘗試著去追溯這一錯誤的原因,他排除了譯者「純粹的無能」,並列出了一些資質佐證巴斯是一位具有學術能力且知識淵博的德裏達翻譯者。韋努蒂隨後得出結論稱這一誤譯不僅是一個疏忽;巴斯的翻譯推翻了德裏達關於不可譯性的主張。在韋努蒂看來,必須要把這種曲解視為症候性的「一種無意識驅動的能指」(222)。換句話說,正是巴斯的「能夠完全翻譯文本的欲望」(223)進入了目標文本。

在這裏需要注意韋努蒂將翻譯中的曲解或口誤隔離出來,並將其根源追溯到單一因素,即譯者「對外文文本被壓抑的闡釋」(Venuti: 220)。也就是說,韋努蒂的闡釋學路徑鎖定了譯文的含義,就好像批評家能夠接觸到譯者的動態歷史和精神生活一樣。然而,翻譯研究打算從另一進路出發。首先,正如弗羅塔所言,只有發出口誤的主體才能識別原因或動機,即使這個原因或動機可能看起來是不完整的,還在持續轉移和變化,是未完成的。其次,無意識對主體的影響並不代表一個連貫的、經驗的以及內在於現實的存在。也正是這樣,我們便可找到一個「隱藏的」想法、情感和意圖,從而使主體擺脫一切形式的壓抑。無意識是一個複雜的概念,我們可借羅賓遜的「混亂自我」來更好地理解它。

埃琳娜·巴塞爾(Elena Basile)和安妮·昆尼(Anne Quinney)等其他翻譯學者已經嘗試使用精神分析來探索翻譯過程與翻譯成果。巴塞爾感興趣的是「翻譯過程中更難以捉摸與更隱匿的方面。她反對將譯者不假思索的選擇歸結為「一種可被直觀的意識形態立場」(*Most Intimate Act*: 1)。在一篇論文中,她對無意識所起的作用進行了精神分析研究,用以「解釋翻譯的力比多經濟」(ibid. 2)。

在後來的文章《回應他者的神秘話語:精神分析下譯者的工作》(*Responding to the Enigmatic Address of the Other: A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or's Labour*)中,巴塞爾借鑒了精神分析學家讓·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將無意識構建為「à traduire」(待翻譯)和其對「誘惑場景」的解釋來質疑在譯員做翻譯工作時對他人作品進行閱讀/寫作的動力。巴塞爾將翻譯場景等同於人類面臨的「原初誘惑場景」,即成年人的匿隱資訊在孩子能夠理解前就不知不覺地「植入」到了孩子身上,從而成為其「內在的他者」,並從內部與主體溝通,擔負起驅動產生「待翻譯」狀態的職責(*Responding*: 15)。因此,翻譯的場景與人類最初面臨的誘惑場景一樣,觸發了「主體的內在 he 者」。這一「他者」可通過主體的選擇、行為和症狀來證明其存在。簡言之,這一理論框架與文學翻譯分析的相關性在於建立了譯者的情感機制,並有可能可以解釋「他/她選擇的獨異性」(ibid. 16)。

為說明這一點,巴塞爾查看了於 1989 年首次發表的加拿大女權主義合作翻譯實驗專案。該專案由 Tessera 編輯團隊負責,內容是洛拉·勒米爾·托斯特文(Lola Lemire Tostevin)的英譯法系列詩歌。每篇翻譯均附有簡評。注解內容是譯者說明本人的翻譯過程和翻譯抉擇。巴塞爾對這些翻譯做了比較並審查了簡評。她注意到第一個譯者選擇將「espaces vers / vers où?»譯為「綠色空間傾向於什麼/去哪裏?」,這表示「vers」的聽覺聯想(法語中 vers「向……」的發音與 vert「綠色」以及 ver 意為「蠕蟲」完全相同)在情感上優先於其語義配價。如此的優先性僅抵制一部分浮現,原因在於她遺漏了「蠕蟲」(*Responding*: 22)。詩中沒有出現「vert」和「ver」二詞,但聲學意義上的相似性使譯者將 tending to「傾向於」,green「綠色」和 worm「蠕蟲」視為「vers」的潛在等義辭彙,並最終選擇了「green」和「tending to」。該案例表明「這種複雜的情感是翻譯的欲望和必須忠於原文間的潛在衝突造成的」(ibid.)。在譯者看來,「翻譯……總是會或多或少留下偶然的誤

讀。我說‘或多或少’是因為我傾向於在我所欲望的意義方向上犯錯」(cf. *ibid.* 22)。

巴塞爾還發現了譯者的一種傾向,即強調「詩歌的感染力與吸引她做出特定言語選擇間存在複雜的偶然關係」(*ibid.* 22)。這些選擇並不「總是來自意識,而是往往「發生」在充滿情感的時刻,這優先並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譯者掌握語義的欲望」(*ibid.*)。最後,巴塞爾評論道:「在這些實踐中,翻譯的功能是一種對話式和開放式的反應過程,即通過觸發‘待翻譯’語言對本人語言的影響,將感知到的「待翻譯」場景在自己的語言中顯現(*ibid.* 26)。

安·昆尼(Anne Quinney)在《翻譯作為移情:翻譯問題的精神分析方案》(*Translation as Transference: A Psychoanalytic Solution to a Translation Problem*)一文中探討了精神分析體系的移情和抵抗。在她的文章中,昆尼將注意力轉向譯者的經驗。譯者受制於一系列關係所帶來的權力制約,即他/她與作者、目標語言以及該語言所附帶文化的關係,以及譯者與翻譯文本和譯文受眾、出版社和審稿人的關係(112)。因此,精神分析發展成一種理解譯者與文本或譯者與作者間層次結構的工具(*ibid.*)。

基於貝爾曼(Antoine Berman)的研究,昆尼「要求將文本變形視為譯者無意識欲望必然導向的副產品」(Quinney 112)。昆尼較貝爾曼更進一步,認為無意識「以一種主動且具有決定性的方式發揮作用,影響譯者在翻譯文本過程中在辭彙、句法和結構上所作的選擇」(113)。為說明這一點,昆尼強調了她在將彭塔利斯(J. B. Pontalis)的回憶錄《窗》(*Fenêtres*)翻譯成英文時遇到的一個問題。昆尼分析了理解源段落時的困難,並諮詢了這名作為執業精神分析師的作者。此後,昆尼發現了阻礙其重組父姓替代品的句法結構的根本緣由:她一直反對父姓替代的說法,即人們甚至可以尋找一個替代品去替代父親(114)。

她無法把一個在句法上很簡單的法語結構轉換為英語,這種轉換困難或會視為一種症候行為,表達了譯者的無意識對句子含義的阻抗,重演了「俄狄浦斯戲劇式的鬥爭」(111)。彭塔利斯認為,這並非源於譯者注意力的不集中,而是譯者的弗洛伊德式失誤。昆尼認同弗洛伊德的理論,並斷言:「文本『激起了』讀者的防禦機制,她需要誤讀來修改那些讓其痛苦的資訊或指責,以適應對願望的實現或拒絕。」(115)

瑪爾塔·馬林-多明(Marta Marín-Dòmine)的研究《翻譯設計:精神分析和語言》(*Traduir el desig: psicoanàlisi i llenguatge*)或為精神分析理論介入翻譯的最新著作。與之前的理論家類似,馬林-多明對語言以及語言工作的研究基於「雙重文本性」的假設:語言學話語和無意識話語。無意識的話語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分析的主題。然而,精神分析實踐已然是一種翻譯實踐,這一學科的方法論可提供針對原文、譯文以及翻譯過程的細緻理解。

這本書詳細闡述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無意識、欲望和原初能指概念。該著作的第一部分向讀者介紹了精神分析對語言功能的假設。第二部分探討了真理、意義和風格的概念,在作者看來,翻譯和精神分析以前對這些概念有著不同的理解。作為言語單義實體的意義(*sentit*)而言,精神分析反對所指,這是因為能指具有優先於所指的原初性以及其與其他能指的關係(102)。最後,馬林-多明在修辭所定義的風格基礎上增加了快感^[1]這一概念。馬林-多明比較了米格爾·德·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的《涅布拉》(*Niebla*: 160)中的一段英譯,用以闡釋將精神分析方法論應用於翻譯實踐中的建議,在馬林-多明選擇的段落中,譯者將形容詞「*augusta*」(指故事的主角奧古斯托)譯為「*exalted pose*(歡快的姿態)」;將「*Estaba tan elegante, tan*

[1] 快感指的是無意識主體的力比多經濟,巴塞爾也曾探討這一概念。

esbelto, plegado y dentrode su funda! (意指男主角的雨傘)譯為「Didn't it look beautiful and slim, elegantly folded, and in its cover? (這傘看起來漂亮又纖細,折疊得很優雅,而且在傘面裏,是不是很漂亮?)」。

在分析了譯者的選擇和理由後,馬林-多明得出結論,譯者的翻譯決定取決於與原文不同的預設,這也影響了目標文本的建構。如果譯者「傾聽文本表層」,她就會發現「Augusto(奧古斯都)」這個名字和形容詞「augusta(威嚴的)」(161)之間存在互文關係,也與奧古斯都皇帝形象存在互文指向(162)。在她看來,在對能指及其與其他能指的關係進行精神分析解讀後,譯者本可以選擇對該術語進行更直接的翻譯方式,即「august(八月)」,進而保留互文聯系。將「esbelto(苗條)」翻譯為「beautiful(美麗)」也將懸置了這種互文關係。這樣,指向奧古斯都皇帝雕像的主題已不存在;譯者同樣明晰了第二個短語的主語,從而消除了原文的歧義。

在馬林-多明看來,「這段文字體現了一種旨在恢復文本的「深刻」含義,而忽視能指規律的翻譯方法。譯者到最終都沒有發現……這些字母在眾目睽睽之下與單詞構成一個整體,給出了一個嵌套在文本最表面的意義」(ibid. 162)。儘管馬林-多明的建議在多大程度上比譯者的選擇「更合適」或「不那麼主觀」還是一個疑問,但事實是,至少有兩個例子(形容詞「augusta」和「esbelto」),譯者作了靈活選擇,譯者同樣也未過多選擇代詞「it」。

馬林-多明的方法不僅適用於翻譯過程,而且適用於閱讀原文和目標文本,這種方法用拉康術語來說就是所謂的「懸浮注意」(escolta flotant)(ibid. 163)。這種方法會讓分析師放棄理解被分析者的話語,不去錨定其表達的具體含義。相反,要鼓勵分析師關注這些話語的無意義,去聆聽聲音、電話留言、單詞、表達方式、鬆散的短語、停頓和排比等,力圖讓分析者反思自己的話語,以及關乎其自身利益的問題。當此方法應用於翻譯時,譯者要尊重作者賦予單詞(能指)的實際內容,要選擇對原文更直截了當的翻譯。馬林-多明引用了伯納德·蒂斯(Bernard This)和皮埃爾·泰維斯(Pierre Thèves)的說法稱,當譯者試圖回溯文本的含義時,他/她最終會通過隱喻——一種等價物——強加一種含義,這種含義通常與譯者本人的觀點契合,而不是與原文話語中隱含的內容有關(163-167)。

將這種精神分析方法應用於翻譯實踐能取得多好的效果仍是一個疑問。拉康精神分析認為「追求意義會導致主體在大他者的意義和大他者的欲望中進一步異化」(Fink: 88)。鑒於此,開展分析時要避免追求意義,而譯者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給意義加標點符號,在意義的不斷滑動中錨定一個意義。此外,我們需記住,拉康的「所指在能指鏈中不斷滑動」(Lacan, *Écrits*: 419)這一說辭並不意味著能指不存在可辨別之所指。原因在於,「拉康如此發言並不是因為他認為我們無法真正解釋精神分析文本……而在於我們無法確定它們的含義」(Fink, 88)。譯者必須學會決定單詞的含義,並選擇一種方式在目標語言裏表達該含義。然而,如此翻譯與解釋文本便存在著風險,因為我們無法避免在目標文本的重建中說出(和做出)本人附加的內容。

四、結語

利用精神分析分析翻譯中的主體都存在一個共同點,即探討超越譯者意識或是可控範圍的要素。對於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來說,譯者的工作意味著,在翻譯過程和翻譯成品中浮現的無意識具有連貫性,並會對

譯作造成不可預見的幹擾。過去的每項研究均旨在解釋或證明翻譯工作無法脫離這些無意識層面的影響，並堅持認為誤讀、誤譯或曲解等翻譯問題均不是偶然發生的。由此可見，這些學者的研究創造了與翻譯話語平行的話語，因為對他們來說，誤譯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無意識的驅力、欲望或願望。

總結來看，無意識被理解為一個超出譯者認知範圍的普遍範疇，它在閱讀、闡釋原文以及生產譯文這一流程的至少五個環節起作用：

1. 選擇要翻譯的原文(巴塞爾)
2. 閱讀並闡釋原文以生成目標文本(弗洛塔、昆尼)。
3. 翻譯過程中與作者的關係(昆尼、某種程度上巴塞爾的研究也涉及這一內容)。
4. 關於受眾(包括教師)和讀者(羅賓遜、阿羅約、弗洛塔、昆尼和巴塞爾)的權力等級。
5. 生成目標文本(本文提到的大多數作者均涉及了這一方面)。

認識到無意識的普遍性後，這些研究者繼續利用精神分析理論識別翻譯過程與成品中的相應現象與概念。其中就包括移情、抵抗、俄狄浦斯、防禦機制、能指、他者和壓抑。這些精神分析術語對翻譯主體進行了較好闡釋。例如，巴塞爾強調翻譯選擇的情感先於語義，而昆尼則討論了她自己在理解俄狄浦斯文本片段中所遇到的困難。弗洛塔區分了二元錯誤和非二元錯誤，並將後者等同於言語錯誤，並可得以闡釋。她還談到譯者的獨特之處在於譯文無意識地浮現，且這些浮現並不一定會破壞目標語言中既定或可預測的語義內容。另一方面，韋努蒂將「無意識的剩餘」發展為誤譯，這一剩餘「可能會壓抑對外國文本的闡釋」(Venuti: 220)。馬林-多明鼓勵區分轉喻翻譯和隱喻翻譯，以強調逐字逐句閱讀的重要性，從而避免對目標文本產生主觀幹擾。

總體而言，相關研究需尋覓無意識在翻譯中的體現，譯者書寫目標文本的過程或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毫無疑問，落筆書寫定會呈現可待查證的無意識痕跡。儘管如此，體現無意識影響的翻譯案例仍然有限，亟待學界繼續努力，挖掘更多的支撐材料。

(Editors: JIANG Qing & KCJ)